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

隐蔽等方式继续斗争，并将工作重点转向农村。1936年2月，邓止戈在毕节随红二、红六军团长征，6月秦天真从黔南经上海赴延安，省工委停止活动。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斗争。1937年9月，党中央先期派黄大陆以特派员身份从延安回到贵阳，与在贵阳的李策一起以省工委名义开展工作，后指派邓止戈、秦天真由延安重返贵州，于1938年2月组建新一届中共贵州省委。省工委积极恢复党的活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4月，邓止戈从南方局回到贵州，传达了南方局的指示，撤销中共贵州省委，成立中共贵州省临时工委。从1938年2月至1941年9月，省工委和省临时工委积极营救被捕同志，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贵州抗日救亡运动，在贵阳地区先后建立了八届县委，吸收100多名先进分子入党，在学校、社会团体、邮电、运输行业中建起党支部22个，推动全省革命。

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贵阳地区隐蔽下来的中共党员坚持组织党小组，创办地下刊物，开展读书会活动。1947年12月，省临时工委疏散到重庆的贵州籍共产党员张立，受命组建黔北工委，在黔北、黔东南等地发展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贵州，1949年2月，中共中央上海局香港分局决定由张立等组成“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省工委成立后，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工作重点放在贵阳等大城市，但不搞武装斗争，注意隐蔽力量，注意发动和保护群众；争取上层人物，打入敌人内部，着重分化策反、护厂护校，保护交通，迎接解放，配合接管建设。1949年11月15

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日，解放军二野五兵团十七军五十师进入贵阳并警备，贵阳宣告解放，标志着国民党反动当局在贵州统治的结束。12月底，全省各县市基本解放。

贵州省工委的历史功绩

贵州省工委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为赢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一是提供情报，有力支持了红军转战贵州。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省工委负责同志通过打入国民党军队中的地下党员设法弄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地图、密电码本和地空识别标志。省工委提供的这些情报，为红军长征在贵州摆脱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实现西进云南、北上陕北作出了重要贡献。二是唤醒民众，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面抗战时期，省工委积极营救被捕同志，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党的抗日方针，促进贵州抗日救亡运动，推动全省革命工作。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贵阳地方队部、沙驼话剧社、筑光音乐研究会等抗日团体取得了长足发展，为唤醒民众，挽救民族危亡，推动贵州的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三是扩大影响，传播了革命的火种。省工委建立后，广泛吸收先进分子入党，在各行各业中建起党支部、党小组和党的外围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和力量。先后在建义、安顺等地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在黔西北组建了猫场游击队，在建义组建了川黔边区游击纵队；在思南组建了思南游击队；在郎岱发动了“三三暴动”；团结各阶层人士，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护城、护厂、护校斗争，遏制敌人溃逃前的破坏，为贵州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贵州省工委革命斗争的当代价值

省工委的革命斗争经历了不同阶段、不同形式的革命斗争，其无私奉献的伟大斗争精神具有鲜明的当代价值。一是改革发展的不竭动力。省工委建立之初，国家积贫积弱，贵州贫穷落后，改变被压迫、被剥削的现状，必须打破旧的桎梏，建立新的制度。省工委建立于危难之时，斗争于困境之中，蕴含着深厚的红色基因和丰富的革命精神，是“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责任担当，是我们改革发展的不竭动力。二是忠诚干净的生动体现。省工委建立后，贵州的革命先烈用生命践行了忠诚担当。林青向死而生的无怨无悔，黄大陆被捕后狱中三年坚贞不屈的“永远向着真理走”的坚定，李策赤胆忠心的“革命的花朵啊，是需要任何情况下的坚贞来培育的”“执着，都体现了党员的绝对忠诚。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州篇章的当下，以史为鉴，能够从革命先辈筑牢忠诚、淬炼忠诚、践行忠诚、彰显忠诚的英勇斗争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三是担当作为的深刻写照。省工委革命斗争历程是共产党人革命时期担当作为的真实写照。蓝运斌乔装护送中央特派员、黄大陆冒生命危险密送军事图、廖正元巧取敌人密电码等，都体现了敢担当、能担当的英雄气概，是我们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州篇章的动力源泉。四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最好诠释。省工委第一书记林青“愿将满腔热血，换来幸福人间”，彰显了即便牺牲个人生命也在所不惜的精神，谋的是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新时代，我们要以史为鉴，坚持人民至上，书写人民满意的时代答卷。

(执笔：汪延皓 徐伟 陈婧)

以系统观念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

赵付科 高英萌

系，必须注重发挥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的目标导向作用，以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的根本目标凝聚起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各要素的磅礴力量，形成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各要素的整体合力。

完善制度链条。首先，在实践进程中不断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一方面，纾解党的自我革命实践进程中的新问题、新困难，要求党及时健全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填补制度空缺；另一方面，适时梳理总结党在自我革命实践进程中创造的新鲜经验并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不断丰富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要素，也成为健全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重要内容。其次，形成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订立、执行和监督等环节紧密衔接的制度链条。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坚持科学有效的原则，细化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的标准；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压实执行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主体责任；坚持以党的自我监督为主导，运用好人民监督的强大武器，形成全覆盖的监督格局。第三，各领域制度规范紧密配合。各领域制度规范要素瞄准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的根本或总体目标，形成一起发力、协同并进的系统格局，释放出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的整体效能。

协调好各制度规范的主体关系。协调好中央与地方、组织与个人、领导干部与广大党员的关系，确保各主体在与其他主体的紧密配合、有效衔接中完成党的自我

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健全工作。党组织充分考虑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充分尊重每位党员提出的宝贵意见，注重从党员中汲取健全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智慧力量。党员注重总结党的自我革命实践中的新鲜经验并及时按照程序向党组织作出相应反馈，同时自觉主动遵守党中央和地方党组织的相关规定，促进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的贯彻落实。领导干部发挥好模范带头作用，积极主动执行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以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并努力在党的自我革命实践中，形成对党的自我革命规律的深刻认知，自觉为健全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言献策。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要“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由多个要素构成的严密系统，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来整体推进。

聚焦目标导向。首先，从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单个要素来看，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

的设立、修改或废除等必须坚持目标导向，自觉服从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大局。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的设立、修改或废除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标准，其中是否有利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衡量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的最根本的原则标准。其次，从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来看，必须抓住不同阶段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的关键要素，加强各制度规范要素之间的衔接配合，以达成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根本目标的最优解。总之，以系统观念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

红色资源是红色文化与红色精神的载体，是红色教育的源泉。红色资源既具有国家性民族性的特征，也具有地域性历史性的特征。红色资源的历史遗存承载着不同时期不同事件不同人物不同地域的故事，表达着各个历史时期与各个地域的不同特征。当长征时，红军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为我们留下宝贵精神财富。贵州是红色文化的沃土，保护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要贯通历史与现实，突出时代价值，把历史事件与当前发展结合起来。一方面，有助于传承和弘扬革命精神，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通过红色文化教育，可以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深入挖掘红色资源。首先，通过系统的收集和细致的整理，将散落在各地的革命遗址、纪念馆、博物馆等资源进行归类 and 整合，并深入挖掘这些载体背后的历史故事和革命精神。将红色资源转化为通俗易懂、易于接受的课程内容，讲解中国共产党在贵州的革命故事。同时，还要加强与其它地区的交流合作，特别是与具有相似红色资源的地区进行交流合作，共同

用好红色资源创新红色教育

徐瑞

打造红色文化旅游线路，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最后，还需要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提升红色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包括但不限于利用现代传媒技术进行宣传推广，组织红色文化主题活动，以及教育机构、文化机构等进行合作，共同推动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创新教育方式方法。首先，可以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通过VR（虚拟现实）技术，为参观者构建一个逼真的革命历史场景，让他们身临其境地感受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亲身体验革命先烈们的英勇事迹，加深参观者对革命历史的认知和理解，引发他们对历史、对国家、对民族的情感共鸣。此外，AR（增强现实）技术也是我们进行红色文化教育的重要工具。通过AR技术，我们可以在现实世界中叠加虚拟的信息，让参观者在观察实物物品的同时，也能看到与之相关的历史背景和故事，引发参观者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从而增强教育的效果。还可以通过举

办各种活动来增强红色文化教育的互动性和趣味性。比如，可以定期举办红色文化主题的讲座、研讨会，邀请专家学者为大众解读红色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此外，文艺演出也是传播红色文化的重要途径。通过编排和演出与红色文化相关的戏剧、歌舞等艺术作品，让观众在欣赏艺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红色文化的魅力。

强化实践体验环节。首先，走出传统的课堂，不再仅仅依赖于书本和教师的讲述。创新“沉浸式+体验式”学习氛围模式，鼓励学生带着问题去寻找探访、搜集自己家乡的革命故事，深化理论知识内化认同，实现知识体系向信仰体系的转化。引导人们走进历史现场，亲身感受革命时期氛围和情境，是红色文化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以红色传统滋养学风、教风，以红色传统激发治学之风和做人之风，实现春风化雨、立心铸魂的育人效果。组织学生到革命遗址进行参观学习，亲眼看到历史的痕迹，亲身体验到革命先

烈的英勇事迹。这样的实践活动不仅能够让学生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历史，更能够在实践中感悟革命精神的力量，从而增强他们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此外，开展红色主题的研学旅行等活动。通过研学旅行，学生们可以在旅行的过程中学习红色文化，了解革命历史。在旅行的过程中，学生们可以参观革命纪念馆、革命博物馆等场所，与当地的革命老兵进行交流，听取他们的亲身经历和故事。这样的活动不仅能够增长学生们的见识，更能够让他们在实践中深刻理解和感受红色文化的内涵和价值。

贵州红色文化教育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持续投入。通过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创新教育方式方法、强化实践体验环节等措施的实施，更好地保护和弘扬贵州红色文化，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学思践悟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要“完善覆盖农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抓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底线任务，完善覆盖农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加强对农村低收入人口的识别。一是建立识别标准。严格落实把工作对象转向所有农民，把工作任务转向推进乡村“五个振兴”，把工作举措转向发展的要求，在所有农村群众中进行低收入人口的识别，尤其要注重识别标准建设，围绕以是否有无劳动能力等核心指标建立一套完善、科学、有效的识别标准，将包括监测对象中的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户以及因病

完善覆盖农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

罗波

因灾因意外事故支出导致生活困难的群众、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等群体，按照识别标准纳入农村低收入人口范围。二是打通数据壁垒。成立牵头部门，打通民政、农业农村、教育、医保等部门数据，建立并完善覆盖全体农户的监测平台，及时把符合识别标准的农村低收入人口纳入监测平台实施动态监测。按照“及时发现、尽早报告，尽快监测”的要求，对监测数据进行实时更新。三是完善农村低收入人口有序退出机制。对农村低收入人口收入生活状况开展评估，对在政策帮扶下退出退出条件的，应及时予以退出。

完善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一是完善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的组织体系。各地党委要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工作的领导，由党委

农村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工作的组织保障，统筹民政、教育等单位协调推进。二是完善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的资金投入政策。整合财政资金、就业发展资金、东西部协作资金、小额信贷政策以及各类专项资金等，加大对农村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资金投入。三是完善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的产业政策。聚焦地方特色农业、林业等产业，帮助地方产业做大做强，推动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四是完善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民生保障政策。进一步完善农村地区低保政策，确保无劳动能力群体有基本生活保障。完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加大对农村社区敬老院、养老服务站等机构的支持力度，逐步提高基层医疗机构使用的二级医疗机构药品报销比例。

实施分类精准帮扶。产业发展方面，强化链式思维，加强产业与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利益联结。就业方面，对有劳动力的低收入人口通过引导外出务工、公益性岗位、就近就业等方式实施就业帮扶。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提升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劳动技能。公共服务方面，严格落实养老、医疗、医保等有关帮扶政策体系以及有关惠民政策，提升公共服务供给力度，对无劳动能力低收入人口实施兜底救助保障。“扶志”方面，坚持“扶志”与“扶智”相结合，积极宣传各地低收入人口自力更生、勤劳致富的典型，进一步激发低收入人口的内生发展动力。

(作者单位：中共贵州省委党校。本文系贵州省委党校研究专项课题《2024SWDXJKYJZX05》成果)

聚焦贵州“四大文化工程”

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
贵州苗绣数字艺术创新

王欣

近年来，随着贵州旅游产业蓬勃发展，创意文旅产品开始成为游客了解贵州、感知贵州的一个渠道。文旅融合将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以一种动态交融的方式扩大了各自的产业版图，实现了在文化创意中开拓旅游产业的新局面，在旅游发展中寻找文化产业的新出路。在求“新”的方法论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贵州苗绣的数字艺术创新，可以为文旅融合的新场景提供高质量的视觉文化传播内容。

数字艺术创新的基础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和共生。数字化创新过程中，刺绣工艺的传承者与数字艺术创作者两个主体之间文化的差异性及其矛盾，是文化交流与交换的过程带来的。作为技术手段，数字技术本身并不是站在传统技艺的对立面的。文化更不是封闭于人们头脑中的东西，它是思想的流淌与碰撞，是存在于公共符号之中的交融创新。透过这些符号，社会成员之间可以彼此交流世界观、价值取向、文化精神以及其他观念，并传承给下一代。将贵州苗绣工艺以一种数字化、艺术化的图像语言进行新媒介的视觉艺术表达，能够充分传递传统民间美术图像语言中的艺术精神。而从数字艺术中的IP引流到精神共睦，也能实现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有机融合，并将经典的艺术样式及内容以数字艺术作品的方式呈现。

数字艺术创新的推力是艺术意涵的外溢。贵州苗绣图像艺术意涵的外溢，主要体现在图像形式语言的表现力，以及超越形式语言本身的文化价值中，赋予了艺术作品更深层次解读的可能，使观者能够在文化、情感和社会层面上产生更为丰富和个性化的体验。这些可外溢的图像形式元素和内涵基础，正是数字艺术可进行转译的核心价值所在。贵州苗绣之所以在当下依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不仅仅在于它的功能性，更在于图像本身具有的艺术表现力和强烈的感召力。对刺绣图像背后的文化、艺术价值的探索，以及文化认同，是数字艺术转译的基础。分析苗绣艺术的当代美学价值，需要从其图像的文化基因片段中寻找其图像语言背后连续性的逻辑。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早期数字化保护中不曾重视的问题，也是数字艺术创新发展核心问题。

数字艺术创新的目标，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特征的显现。贵州苗绣图像的流变一直是图像志及图像学研究的重点，多元的文化以及在文化交融过程中带来的多元审美，则是图像流变和创新的前提条件。苗绣图像不仅映射了持有者的文化背景，展现了持有者的审美意趣，更讲述着持有者的情感故事。在苗族刺绣图像的背后，是一个具体的人、鲜活而动态的群体在进行视觉化的语言表述。对苗族刺绣图像系统的分类和剖析，并对刺绣图像在服装部件和技艺之间的流动现象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厘清贵州苗族织绣图像之间的互文关系，更可以发掘出文化交融过程中，多元一体的具体视觉呈现。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需要采用整体性持续深入的田野信念，并将“人”和“生活”置于文化感性在地研究的中心。同时，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续发展，必须进行持续的、系列性的数字艺术项目。这些项目不仅可以探索数字艺术创新的可能性，还可以在实践创新的过程中勾连出文化生态的基本精神。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

大家理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健全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机制。这标志着基层治理中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作用，进入了制度建设和完善阶段。充分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要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以小家庭的和谐共促建大社会的和谐。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基层社会治理本质上是对社会个体组成的社会终端的治理，具有现实性、具体性和复杂性。个体是构成社会的基本粒子，个体的素质决定了社会的发展样态，而家庭家教家风对于个体价值观念及行为选择具有关键性影响。作为构成社会的重要单元，家庭是个体与社会连接的轴心，既包含于治理体系内，是基层社会治理聚焦的对象，同时又是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是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家教作为家庭教育功能的集中体现，对于社会个体的教化具有独特作用，是促使个体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嬗变的重要因素。家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家庭层面的具象表达，对家庭及其成员的价值选择和行为取向具有道德规范的功能，从而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发挥着道德规制的作用。

中华传统美德深刻影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我们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进入新时代，中华传统美德对于建设和美家庭、营造良好家教、培育优良家风，进而对社会个体正向精神状态保持、优秀个人素质养成具有重要价值和作用。一是中华传统美德具有家国同构的特征，倡导精忠报国、爱国爱家、有国才有家、注重家国情怀和天下担当，这对于个体在面临个人与社会敦轻敦重的价值选择时，会促使个体做出正确的抉择。二是中华传统美德提倡家庭和谐、夫妻和睦、兄弟和睦、家庭和睦、邻里和睦，这对于消除家庭矛盾、促进家庭稳定进而促使家庭成心贴心、情情相投正向状态具有重要作用。三是中华传统美德在道德层面对家庭成员个体提出了要求，如谦恭诚信、明礼宽人、遵守法纪等，对个体在社会活动中的行为进行了规范。

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当前，随着时代发展，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元，从结构、分工到观念，实现了全方位的现代化转型。家庭成员不再聚拢于家庭所在的某个地域，而是形成了一种四处分布的网状结构，面对新形势、新变化，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适应时代变化，多措并举，传承好、弘扬好中华传统美德，以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一是深度挖掘中华传统美德中与基层社会治理紧密关联的重要文化因子、文化要素，确保中华传统美德在内容上具有时代先进性。二是革新中华传统美德传播范式，通过评选宣传文明家庭、优秀家教家风典型等，不断总结、整理、提炼内涵其中的优秀文化因子，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三是充分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构建起覆盖广、内涵深、智能化程度高的传播网络，尤其是要用好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确保中华传统美德宣传的及时性、全面性、精准性、互动性和生动性。四是坚持正确的舆论宣传导向，对当前互联网行业流量经济盛行，极少数人为哗众取宠、博取眼球，公然挑战公序良俗，与中华传统美德背道而驰，对于这类行为要坚决予以斗争，维护中华传统美德的主流文化地位。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省高校党建理论研究中心。本文系省课程教材建设研究基地课题《2023GZK-CJC0301》研究成果)

本版责编：陈翔 张莹 王瑞钧 杨春凌 版式设计：查雨施